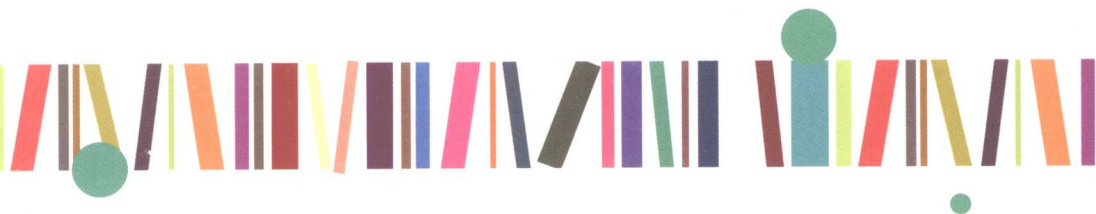


# 回荡的钟摆

中国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  
坚定市场化是唯一出路

许小年◎著



*China: Market Economy or Planned Economy*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时隔六年重磅新作  
深度解析“中国模式”，探索市场化回归可能



中国计划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理享家

# 回荡的钟摆



中国计划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荡的钟摆 / 许小年著. —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82-0662-9

I. ①回…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62号

## 回荡的钟摆

许小年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jhpress.com](http://www.jhpress.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国宏大厦C座3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010) 63906433 (发行部)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mm×1092mm 1/16 21.5 印张 206 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82-0662-9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 回荡的钟摆

上一本文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出版是2011年，自那时至今，世界经济似乎仍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凯恩斯主义者的误诊让失望已极的民众继续等待救世主的显灵。奇迹却没有发生。希腊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反复地蹂躏这个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欧洲央行的数量宽松掩盖不了意大利银行的坏账，罗马不得不在长达八年的拖延之后，着手处理数千亿欧元的不良资产。安倍经济学虎头蛇尾，结构改革之箭烂在囊中也没有射出，政客承诺的繁荣迟迟未现。

惟有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看不见的手”以看不见的方式悄然清除了格林斯潘的遗产——滥发货币留下的违约债务以及大幅缩水的金融资产。市场而不是美联储充当了清道夫，通过痛苦的破产清算矫正了严重失衡的资产负债表。美国经济于2011年前后步入复苏，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金回流，致使美元币值节节升高。

太平洋东岸被迫去杠杆之时，西岸在热火朝天地加杠杆，“四万亿”的洪荒之力强硬地造出了一个V-型反弹。然而透支未来的亢奋不仅无法持续，而且让后人的日子更加艰难。中央政府于2016年确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缓解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

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

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2008年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结合第四部分，着重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援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策实践，说明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短期刺激与麻痹的双重作用，以及这些政策的长期危害。危害之最莫过于人们误以为印钞可以创造价值，财政支出可以创造有效需求，不知经济增长的本源是企业的创新和效率的提高，不知创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法是提高收入，而收入又取决于企业的效率。诚如法国经济学家在19世纪初所言“供给决定需求”，这也是今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精神。

在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的第二部分提出若干关于改革的建议。在中国的改革历史上，成功的方案不是出自古代的宫廷或现代的办公室，而是源于实践中的摸索和市场上不断的试错。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在于总结民间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时地调整法律和政策，总结和推广民间的经验，就像1980年代党中央将小岗村的自发改革推广到全国一样。

沿着供给侧的思路，第三部分探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移动技术对传统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接连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面前，传统企业先是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随即又恐慌性地拥抱互联网，“不触网则死”和“一触即灵”成为万应的商业箴言。笔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既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也没有改写经济的规律，如同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一样，互联网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中的一项，企业要充分利用这项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的创新，而不能本末倒置地盲目相信“互联网思维”的神话。

第四部分记录了笔者从创新到制度、从制度到社会、文化的思考历程，与其说寻求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制度特别是私人产权制度决定创新，那么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与人们的愿望相反，历史没有展现出单线条的因果关系，没有为识别那个终极推动的智者预备不朽的荣誉。社会制度体系在观念、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演化，有时前进，有时停滞，有时倒退，偶然事件和微不足道的人物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能够找出某些逻辑关联已十分幸运，若想归纳总结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就属于人类的“致命自负”（哈耶克）了。

2017年1月9日

# 目录

## 第一辑 | 中国：形势与对策

- 两个中国模式 · 002
- 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 014
- 反弹如南柯一梦 · 034
- 经济如何走出今日之困境 · 044
- 应对漫长的经济冬天 · 052
- 怕疼治不了病 · 061
- 人民币还会贬值吗 · 069
- 看到希望 · 081

## 第二辑 | 改革：政策与实践

- 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 · 086
-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 114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122
-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 131
- 房价、土地供应与公平博弈 · 140
- 金融改革的路径 · 146
- 医疗行业中的市场与政府 · 153

## 第三辑 | 企业：转型与创新

- 互联网是转型利器而非神器 · 160
- 互联网金融：提高效率而非改变规律 · 169
- 经济下行中的企业创新 · 175
-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 182

## 第四辑 | 学理：常识与洞见

- 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 · 200
-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 207
- 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 214
- 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 · 229
- 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 · 244
-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 260
- 资本主义：颂扬与怨恨中的飞跃 · 269
- 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 276

## 附录

- 中国需要推进观念现代化 · 310
- “刀锋”许小年 · 317



第一辑

中国：形势与对策

# 两个中国模式

## 什么是“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多项成就，其中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作用下，中国在世界性的衰退中不仅“风景这边独好”，而且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这种有别于印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斯大林式计划体制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时间，中国模式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人也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

然而，拯救世界的“四万亿”计划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近年来，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却增长乏力，并且连连暴露出一系列较为严重问题。GDP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负债累累，2015年令人震惊的国内股市暴跌，更让整个世界为中国经济出了一身冷汗。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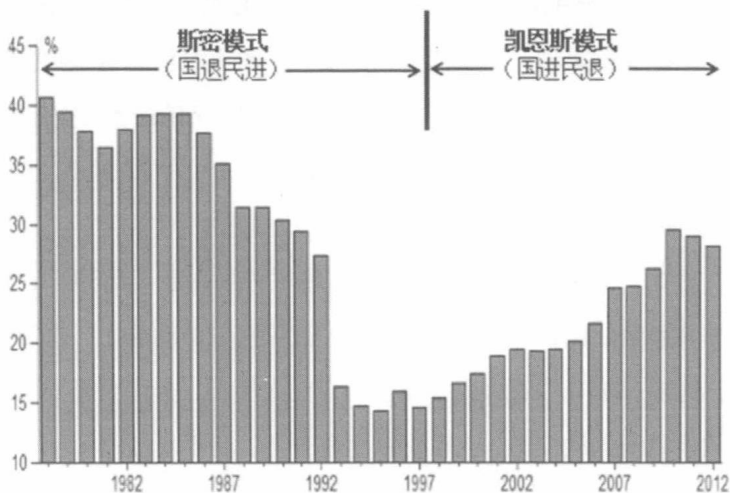
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迅速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观察家和评论家盛赞中国模式，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现在又皱起了眉头，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模式突然失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根据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强势，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资源调动能力，想干就能干，比如2009年说花钱就能拿出四万亿人民币，全世界恐怕惟独中国政府具备这种能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所在的柏林（笔者当时在柏林访问），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堂堂首都，想建个新机场，今天要看选民脸色决定是否开工，明天资金又成了问题，修修停停，竣工遥遥无期。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建了多少个机场？连高铁也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势政府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不应该出问题，中国模式应该运转得很好，因为政府现在依然很强势，如果不是比过去更加强势的话。

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前后两个阶段组成，所谓“大政府”“强势政府”在后一阶段才出现。在前一阶段，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断后退，民间力量的持续发展壮大，前一阶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国退民进的“小政府”（见图一）。靠“小政府”模式，中国同样实现了年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图一、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注：资料来源为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官方统计年鉴与网站，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以及能找到数据的基金、土地出让金收入。虽然1993年财税改革后的统计口径与之前的不直接可比，但趋势十分明显。在斯密模式阶段，政府支配的资源相对于经济总量逐年下降，而在凯恩斯模式阶段则显著上升。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在这一认识框架下，我们首先回顾改革的历史，揭示在第一阶段上经济腾飞的真正动力；然后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 前一阶段：亚当·斯密模式

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何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举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那一年，18位村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冒着极大的风险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将人民公社的土地包产到户（组）。包产到户、盈亏自担这一模式同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这一模式相比，优势在哪里呢？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后一模式下缺乏明确的产权和利益归属，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包产到户的经济学意义就是在明确利益归属的基础上，解决了激励（incentive）的问题。

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激励，我曾在陕北农村插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天爬到山上干活儿，登高远望，哪片是生产队的地，哪片是私家自留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庄稼青黄相间，无精打采，自留地上的油绿兴旺，茁壮挺拔，对比十分强烈。生产队的地里种不出好庄稼，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公地的悲剧”。

包产到户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促进是巨大的，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改变，农村的面貌却焕然一新，并且很快解决了困扰中国城镇多年的农产品供应问题，商店里粮食和各类副食的品种丰富，数量充足，粮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城镇居民限量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民间自发的行动，没有政府的设计或者引导。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的作用在于不干预、不打压，肯定、总结和推广民间的创新，把包产到户提升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1999年，全国人

大岗村村民自发的“大包干”作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成为自那以后执行至今的基本国策。

包产到户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释放了中国农村的巨大生产力，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领域。人们很快发现，由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由匮乏转向过剩，这就为城镇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私人创办和经营企业合法化，新开办的集体和私营工厂急需劳动力，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正好在这时进入城镇寻找工作。由此可见，没有农业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改革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期，表现为 GDP 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增长并非中国特色，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模式”的特有现象。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超常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19世纪下半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在“一战”前就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的工业化中，同样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正是凭借在这一时期积累的经济实力，日本发动了侵华继而对美国的战争。插一句题外话，德、日两国都是经由工业化后来居上，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世界霸权，最终以战败的灾难收场。观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我们有必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民营化。废除计划体制，不仅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而且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在德、日等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民营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是私营为主体。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企高呢？道理还是和农村的包产到户一样，激励机制上有差别，经营自己的资产比别人的更用心，民营企业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资产增值。

民营化带来的另一层效率改进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从政府指令变成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从“有形之手”变到了“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讲的，如果某种产品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动生产这种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的衔接用不着政府指挥。在计划体制下，没有价格信号，政府想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哪家企业来生产

什么是最合适的。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赚钱的私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利的统一，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

小结一下，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当然，市场和民间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给了足够的空间，比如废除人民公社，私营企业合法化等等。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

## 后一阶段——“凯恩斯模式”

大约在1990年代中晚期，经济增长模式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趋势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转升。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政府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财政税收的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力。如图一<sup>1</sup>所显示，财政收入对GDP的比

---

1. 1993、1994年财税改革前后的统计口径不同，数据看上去发生“断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绝对水平也许不可比，但总体趋势支持我们的观点。



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阶段；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晚期开始逐渐上升，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或者叫作国进民退。

模式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改革的停滞。斯密模式要求持续的制度创新，像包产到户那样的制度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的计划体制，释放市场和民间的能量。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体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怎么办呢？顺手拈来凯恩斯主义，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从此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投入的资金有十几万亿之巨。凭借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拉动，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可惜好景不长，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三个季度，经济重新进入下行通道。于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万亿2.0”，这一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图二）。在图二中我们用电力消耗而不是GDP数字，电力消耗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出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实际状况。

从亚当·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挥作用的空間被大大挤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政府那只“看得